

子女留守对农民工收入与支出的影响

杨 娟, 李凌霄

[摘 要] 探讨子女留守决策对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影响, 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 CHIP2013 流动人口数据, 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能力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讨论了农民工子女留守对父亲收入与家庭支出的影响, 探究留守问题产生的根源。研究发现: 子女随迁会提高父亲的收入, 但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 子女是否随迁对父亲的收入没有影响。暗含着能力高的父亲, 更可能让子女随迁。同时子女随迁会增加农民工家庭的支出, 尤其是教育和住房支出, 不利于进行经济积累。此外, 子女在县城、地级市以及省会城市读书对家庭支出的影响差别较大。

[关键词] 子女留守; 农民工收入与支出; 流动

一、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日新月异, 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 被称为农民工。关于农民工群体, 有两个方面尤其受到大家的关注: 农民工收支问题与留守儿童问题。

近年来, 随着贵州留守儿童自杀事件等类似社会问题的频发, 留守儿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留守决策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 流动人口一般无法取得当地户籍, 在流入地无法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家庭内的因素如经济状况和父母的认知水平以及个人观念等也对子女留守决策有影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现有研究多着眼于留守的原因, 对留守的影响因素进行多方位的分析, 比如家庭特征、地区财政政策、迁移距离以及迁入地的户籍门槛, 这些都会影响到农民工父母对孩子安置问题的决策。其

[收稿日期] 2016—11—29

[作者简介] 杨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电子邮箱地址: yangjuan@bnu.edu.cn; 李凌霄,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lingxiaomeow@mail.bnu.edu.cn。

中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被认为是一个显著影响子女安置问题的因素。

但研究很少从反方向入手,考虑农民工子女留守或随迁对其父母收入、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为了进行经济积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更高的收入和更快的经济积累速度无疑是其在外工作的主要奋斗目标。但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子女接受教育的成本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可能违背了其最初去城市打工的初衷。本文通过分析子女留守,子女在县城、地级市以及省会城市读书对父母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为政府制定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提供参考建议。

具体而言,本文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子女留守或随迁是否会影响父母的收入?不同的随迁地对父母的收入影响有多大?对此主要从子女留守或随迁对父亲和母亲工作时间的影响,进而影响其收入的角度进行分析。此外,由于能力高的父母更有可能将子女带到工作地,我们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试图剥离父母能力带来的自选择偏差。第二,孩子留守、在县城、地级市以及省会城市读书对父母支出有何影响?我们特别关注孩子在不同地点上学的教育成本。影子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我们想通过入户调查数据了解在不同地点上学的流动人口的子女的教育成本差别有多大。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收入支出及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关于农民工子女留守的影响因素分析。宋锦和李实(2014)利用2008年的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民工子女的随迁决定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从事自主经营、配偶的教育程度较高、迁移地点近等因素对子女随迁决策有正向影响。杨舸(2011)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子女的随迁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合适的照料人是儿童随迁的基础。梁宏(2010)利用2006年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对农民工子女留守随迁决策进行考察,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不仅受制于家庭因素,也与社会因素相关:留守决策不仅受到子女的年龄、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等与家庭相关的因素的影响,还与农村社会支持度、迁入地户籍制度的约束等社会因素不可分割。张翼和周小刚(2012)对随迁农民工子女就学情况的研究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制度对留守决策的影响,农民工子女异地就学需要缴纳借读费,并且其就读的学校、班次明显次于城市子女,辍学率也很高。

另一方面着重于农民工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高文书(2006)通过北京、沈阳、石家庄、无锡和东莞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

进行分析,发现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存在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高、就业行业高度集中、雇佣管理不规范、劳动关系紧张等特征;男性农民工的工资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工年龄、进城工作时间以及受教育程度都对收入有着正向影响。叶静怡、王琼(2013)使用 Roy 模型对 2010 年北京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选择自雇佣的农民工收入高于工资部门农民工,这可能是由于不可观测的能力带来的偏差所致。研究还发现,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农民工选择自雇佣就业方式的概率更大。除上述文献提及的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类型外,农民工的健康也对其收入有显著影响。苑会娜(2009)对来京务工经商农民的健康状况和收入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初始健康状况越好,其收入越高,但个人收入的获得又损害了健康。也有研究发现子女性别对农户收入也有影响,罗凯(2011)通过面板模型发现,在一孩情况下,生男孩的家庭年收入更高。在家庭消费支出方面,农民工普遍更为保守,但也受到城市消费观念的冲击。孔祥利、粟娟(2013)对全国 28 省农民工消费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外出务工农民工普遍具有简朴节省的低消费观念,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的限制使他们对未来预期悲观,进而在消费上保守。于洁(2015)通过对山东青岛的实地调查发现,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教育支出行为会受到城市高收入家庭的影响,他们会效仿城市家庭教育的支出结构,提高教育支出水平。

总的来说,国内研究农民工收入的文献多着眼于教育水平、职业等个人因素以及社会制度、政府政策等社会因素。较少关注单一的、家庭内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而关于外来务工人口面临的一个重要决策——子女留守还是随迁,研究集中于对留守的多因素影响分析,而关于子女留守或随迁对父母造成的影响则极少涉及。本文将从农民工的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入手,尝试探讨子女留守与否对外出务工人员经济方面的影响。

三、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数据为 2013 年中国居民收入入户调查数据(CHIP2013),该数据涵盖了城市、农村和流动人口。我们仅选取了其中的流动人口住户样本。其中包括在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等 14 个省市按照概率抽样抽取的外来务工人口样本。这套数据对于外来务工家庭特征描述的较为详尽,对于外来务工住户的留守家庭也有详细的记录,适合用于本项研究。首先,我们通过样本类型对总样本进行筛选,保留所有的外来务工住户样本即户主有农业户口(包括改为居民户口时的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而且户口所在地是现住的乡镇(街道)外的住户,共 2210 个。然后通过家庭户信息对样本进行合并,将父母和孩子配

对,形成外来务工人口家庭户,保留其中有孩子的家庭户,此时样本量为 694。接着我们对家庭中孩子的年龄进行筛选,考虑到农村青少年有较高比例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我们将年龄范围限定为 0~16 岁,这个年龄区间的孩子需要家长的照顾,且未到法律规定进入劳动市场的年龄,无固定经济来源,依附于家长生活,对家长的需求和影响都更大。这样我们得到最终的 437 个样本。本文所使用的外来务工人口数据是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调查所得,因此我们主要考察流入地家庭户的情况。对于孩子留守与否的定义,根据我国每年寒暑假的一般长度,本文将不在本户居住时间超过 3 个月的孩子视为留守,其中本户指流入地家庭户。在 437 个家庭户中,子女随迁的有 339 户,占样本总量的 77%,而子女留守的有 98 户,占样本总量的 23%。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农民工家庭中父亲一般为经济支柱和家庭支出的决策者,本文只考虑留守对父亲收入的影响。

表 1 子女留守和随迁家庭的各项特征对比

	留守(98)		随迁(339)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父亲年龄	37.63	5.53	36.99	5.32
父亲受教育程度	8.4	2.15	9.5	2.86
父亲年工资收入	40336.94	24151.74	47784.06	35171.60
父亲年工作时间	2620.11	917.9	2801.81	866.95
父亲健康状况				
较好	87.63		90.80	
一般	10.31		7.37	
较差	2.06		1.77	
父亲是否自雇佣	0.28	0.45	0.40	0.49
母亲年龄	35.69	5.37	34.92	5.48
母亲受教育程度	7.73	2.23	8.82	2.47
母亲年工资收入	15911.22	18756.56	20420.12	26352.23
母亲年工作时间	1614.52	1542.07	1986.13	1559.78
母亲健康状况				
较好	84.54		92.33	
一般	14.43		7.37	
较差	1.03		0.29	
孩子性别	0.61	0.49	0.52	0.5
孩子年龄	9.24	4.46	7.78	4.3

续表

	留守(98)		随迁(339)	
孩子受教育年数	3.92	3.48	3.1	3.16
总支出	34529.69	30841.8	46783.6	28179.74
烟酒支出	1043.21	1232.66	1059.43	1435.85
住房支出	7208.63	11004.25	9712.94	8595.3
教育支出	4746.61	7482.81	5423.11	6610.11
留在迁入地意愿				
五年及五年以下	17.07		10.70	
一直待下去	52.44		54.24	
不确定	30.49		35.06	
母亲不在本户 居住时间 ^①	8.40	5.16	0.43	1.65

从表 1 可以看出,留守样本和随迁样本存在着相当的差异。选择使孩子随迁的家庭,父母年龄较小,均比选择留守的父母小 1 岁左右。从受教育年限来看,随迁孩子所在家庭的父母受教育年限较高,与留守家庭有约 1 年的差异。观察父母的健康状况可知,随迁家庭父母的健康状况要好于留守家庭,尤其是在母亲的健康状况方面,随迁家庭母亲健康状况为较好的比例为 92%,显著高于留守家庭的 84%。这可能反映了年轻的接受过更高教育的父母更为注重孩子的教育和对孩子的陪伴,进而选择让孩子随迁;而健康状况较差的父母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照顾孩子,倾向于让孩子留守。两类家庭中母亲不在本户居住的时间存在极大的差异,选择留守的家庭中母亲不在本户居住的时间的均值要比随迁家庭多出 8 个月。

在本文着重关注的收入与工作方面,随迁家庭的父母收入明显高于留守家庭,其中留守家庭的父亲年收入比随迁家庭低了约 7000 元,而母亲则低了 4000 元左右。留守家庭父母的年工作时间也较低,父亲年工作时间较随迁家庭低 180 个小时,而母亲则低 400 个小时左右。在就业选择方面,随迁儿童的父亲自雇佣比例更高。我们因此猜测,父母从事个体经营,拥有大量自主时间,可以兼顾照顾孩子,这种情况下,父母也更倾向于让孩子随迁。在农民工家庭支出方面,选择孩子随迁的家庭的年总支出更高,比留守家庭高约 11000 元。随迁家庭在居住和教育上的花费也都高于留守家庭,尤其是在住

^① “母亲不在本户居住时间”,根据数据处理方式,本户特指非户籍地的居所,即流动人口在其流入地的居所。

房方面的支出,随迁家庭比留守家庭高出约 2500 元。在教育方面,留守家庭的支出也较低,较随迁家庭低了约 700 元。我们考虑用家庭的烟酒支出来考量家庭的生活质量,从统计上看,两类家庭在烟酒方面的支出并无较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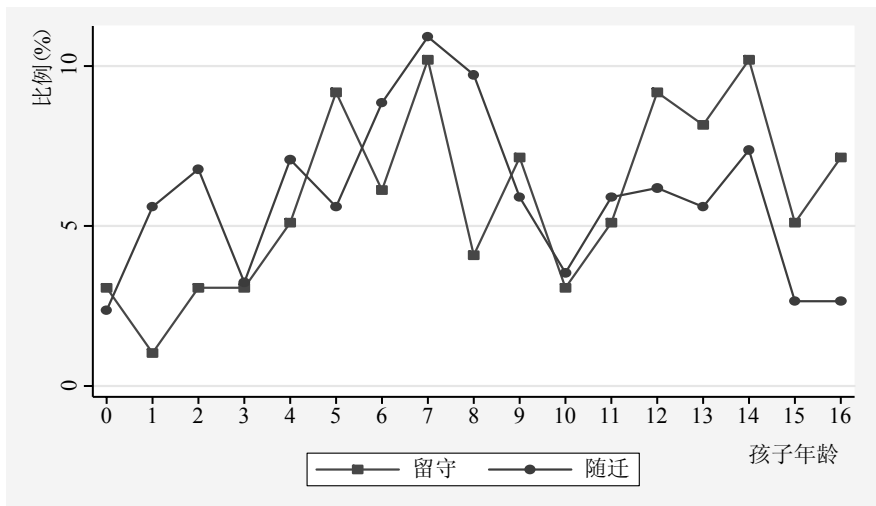


图1 留守和随迁家庭孩子年龄对比

值得一提的是,两类家庭中孩子年龄的特征有明显差别,留守家庭孩子的年龄较大,受教育年数也更高,分别比随迁家庭孩子高出 1.5 岁和 0.8 岁。由图 1 孩子年龄与频率的折线图可以清楚地看出,3 岁以下的孩子,随迁比例明显高于留守;3—11 岁,孩子正好处于幼儿园和小学阶段,随迁和留守比例相当,没有显著差别。由于城市教育质量通常好于农村地区,有条件的父母通常会将孩子带入流入地。12 岁到 16 岁,孩子处于初中阶段,留守比例又开始显著高于随迁。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高中不接受外地生源,因此流动人口的子女不得不回所在地上初中,以便有机会参加当地的中考。

留守家庭的男孩比例较高,为 61%,可能由于农村的大部分农活更需要男性劳动力;而随迁家庭孩子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在迁移类型和未来规划方面,两类家庭无明显差异,半数都表现出了想在迁入地长期发展的愿望,随迁家庭想要一直呆在迁入地的比例稍大,为 54%,但与留守家庭 52%的比例相比,差别并不明显。

四、研究方法

为研究子女留守对农民工父亲的收入以及家庭支出的影响,考虑模型设

定如下:

$$\ln Y = \alpha_0 + \beta X + \alpha_1 F_i + \lambda h + \epsilon$$

$$X = \begin{cases} 1, & \text{若子女留守} \\ 0, & \text{若子女随迁} \end{cases}$$

其中, $\ln Y$ 代表父亲年收入(或支出)的对数, X 代表子女是否留守, 若子女留守 $X=1$, 若随迁 $X=0$, F_i 表示父亲其他的个人特征如年龄、学历和就业状况等, h 表示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在模型中, 我们感兴趣的是 β , 在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 它衡量了孩子留守对父亲收入(或支出)的影响。

但是实际上, 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模型中子女留守这一因素同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和农民工父亲的个人特征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 使得回归结果出现偏差。即,

$$X = \gamma_1 h + \gamma_2 F_i + \epsilon', \quad \gamma_1 \neq 0$$

由于能力因素是不可观测的, 实际上我们的估计方程为:

$$\ln Y = \alpha_0 + \beta X + \alpha_1 F_i + u$$

其中, $u = \lambda h + \epsilon$

根据以上方程, 我们有 $\text{cov}(X, u) \neq 0$ 。我们推测, 能力因素可能会对子女随迁产生正向影响。在一般情况下, 能力较高的父母收入也相应更高, 同时也更有可能选择令孩子随迁。这意味着直接使用 OLS 方法估计得到的子女留守对农民工父亲收入(或支出)的影响是存在向上偏误的。即遗漏能力变量, 使得留守的系数反映的留守对父亲收入的影响包含了父亲能力的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回归:

$$X = \pi IVE + \gamma F_i + v_i \quad (1)$$

$$\ln Y = \beta X + \mu F_i + u_i \quad (2)$$

方程(1)是第一阶段估计方程, 其中 IVE 是子女留守的工具变量。方程(2)为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估计方程。工具变量 IVE 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IVE 与 u 无关: $\text{Cov}(IVE, u) = 0$

IVE 与 X 相关: $\text{Cov}(IVE, X) \neq 0$

通过选取满足条件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 可得到关于 β 的无偏估计:

$$\ln Y = \beta X^* + \mu F_i + \beta v_i + u_i$$

其中 $\text{cov}(X^*, \beta v_i + u_i) = 0$

我们先后尝试了多个工具变量, 例如孩子年龄、母亲工作时间、是否有

祖父母同住^①以及母亲不在本户居住的时间，这四个变量均与父亲收入无直接关系。通过估计我们发现这四个工具变量均对子女留守与否有显著影响。子女年龄越大、母亲的年工作时间越长，留守概率越大；有祖父母同住会使子女留守的概率降低，但这三个工具变量未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

最终我们选择使用母亲不在本户居住的时间作为工具变量。中国家庭中承担孩子抚养照料责任的主要是母亲，母亲不在本户居住时间直接影响到随迁子女的照料状况。母亲不在本户居住的时间越长，孩子留守在家的可能性越大。若母亲不在本户居住的时候是在老家居住，会增加孩子留守的概率；若是在别处打工，仍会降低孩子随迁的可能性。回归结果也显示了这一点。母亲不在本户居住的时间(月)每增加 1 个月，子女留守的可能性增加 37%^②。它符合与子女是否留守相关，但与父亲收入无直接关系的要求，因此适合作为工具变量。接下来将给出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

表 2 工具变量的描述统计与检验

	留守与父亲收入(模型 I)	留守与家庭总支出(模型 II)
工具变量	母亲不在本户居住时间	母亲不在本户居住时间
工具变量的描述统计		
平均值	1.7584	1.7584
标准差	3.9388	3.9388
第一阶段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统计量	415.101	417.867
Stock-Yogo bias critical value	16.38(10%)	16.38(10%)

从第一阶段弱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可知，模型 I 用母亲不在本户居住时间作为工具变量，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统计量为 415.10，大于 10%偏误下的临界值 16.38，即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模型 II 的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统计量为 417.86，远大于 10%偏误下的临界值 16.38。因此，我们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五、子女留守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我们首先使用 OLS 的方法，估计了留守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结果见表

① 祖父母同住指祖父母随迁，在流入地同住。
② 受篇幅限制具体回归结果不在本文列出，可以向作者索要。

3. 由于子女随迁可能会增加父母的照料时间,减少父母亲的工作时间,进而对家庭收入产生影响。模型 1 给出了留守的直接影响,模型 2—4 分别控制了父亲的特征、部分孩子的特征和父亲的工作时间。结果显示,子女留守反而会对父亲的收入产生负的影响,这与描述统计的结果相符。但这种估计方法存在内生性问题,能力较高的父亲,收入也较高,也可能令孩子随迁。因此 OLS 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IV 的估计结果(模型 5)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使用“母亲不在本户居住时间”作为工具变量的模型 5 得到的结果为正值。说明在消除内生性之后,子女留守对农民工父亲收入有促进作用,但估计的结果并不显著,说明这种正向影响并不明显。这印证了我们的猜测:选择使孩子留守的农民工父母一般为能力较低的个体,而那些自身能力优秀的农民工父亲,他们可能对自己未来收入预期更高,永久移民的愿望更加强烈,更有魄力选择使孩子随迁。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能力较高的个体通常收入更高,获得居住地户籍的可能性也更大。

在以上估计方程中,除了孩子留守这一变量之外,我们还控制了农民工父亲的工作时间、年龄、就业状况、流动类型以及省份虚拟变量。工作时间对父亲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我们的常识是一致的:年工作时间越长,总收入越高。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年工作时间每增加 100 个小时,其收入增长约 6%。自我雇佣这一就业方式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造成的,农民工被迫选择自雇佣的工作方式,接受与工资部门农民工相比较低且不稳定的收入。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的是,农民工受教育年数越高,工资收入相应更高;与自我评价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父亲相比,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较好和一般的农民工收入更高,但健康状况较好和一般的人群收入差距并不大。年龄对农民工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更多地与其在城市的工作经验相关,而与年龄并无直接关系,城市的工作性质也决定了年轻的农民工更容易适应接受新的工作环境,获得较高收入,这些因素干扰了年龄对收入的影响,使年龄这一变量的系数不如预期中显著。同时,农民工流动类型对收入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在 OLS 的回归结果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控制了父亲工作时间的模型中,子女性别与留守的交互项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结合留守的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男孩留守对父亲年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幅度不大,而女孩留守则对父亲收入有负的影响。结合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 2SLS 的结果,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于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的影响。在对女孩进行随

迁留守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父亲能力的影响更大。农民工一般来自于经济文化均比较落后的地区,可能受到较严重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对于男孩的留守随迁决策,无论能力高低者都能做出比较客观的选择,因此男孩留守对父亲年收入的正向影响符合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但对于女孩来说,能力较高者可能因为接受能力强、教育水平高等原因,对女儿没有歧视;而能力较低者由于对女儿的忽视,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选择使女儿留守,且能力较低者的收入通常也更低。因此,能力高的父亲更可能使女儿随迁,而能力低的父亲倾向于使女儿留守,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女孩留守对父亲收入有负面影响的结果。

表3 子女留守对农民工父亲收入的影响

因变量: 父亲年收入对数					
	OLS				2SLS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留守	-0.443** (0.2249)	-0.208 (0.2144)	-0.571* (0.3208)	-0.579* (0.3096)	0.0138 (0.276)
孩子性别			-0.257 (0.1904)	-0.219 (0.184)	
孩子年龄			0.0412* (0.0234)	0.0362 (0.0226)	
孩子性别与 留守交互项			-0.593 (0.409)	0.655* (0.3946)	
工作时间				0.000596*** (0.0001)	0.000665*** (0.0001)
自我雇佣		-0.527*** (0.1938)	-0.530*** (0.1927)	-0.753*** (0.1906)	-0.577*** (0.1765)
受教育年数		0.0713** (0.0333)	0.0784** (0.0335)	0.0696** (0.0324)	0.0447 (0.0292)
健康状况 (控制组: 较差)					
良好		3.560*** (0.6414)	3.552*** (0.6412)	2.694*** (0.6384)	3.986*** (0.6654)

续表

因变量：父亲年收入对数					
	OLS				2SLS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一般		-1.5572 (0.3114)	-1.5623 (0.3135)	-1.5153 (0.3827)	-1.4736 (0.2604)
弱 IV 检验					415.10
R ²	0.0088	0.1869	0.1963	0.2671	0.3020
N	437	437	437	437	437

注 1：表中控制了父亲年龄、劳动合同类型、年龄、省份等变量，为了节省篇幅，结果没有报告。

注 2：*** 表示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六、留守对农民工家庭各项支出的影响

下面我们分别估计孩子留守对农民工家庭各项支出的影响。主要从家庭年度总支出、烟酒支出、住房支出和教育支出四个方面考察。其中，家庭总支出反映了家庭本年度总体的消费状况；烟酒支出是一项弹性较大的支出，我们通过它来观察家庭的生活质量；住房是刚性需求，但因房屋条件、地理位置不同的住房价格也有所区别；教育支出则直接反映了就学的难易程度和父母对教育的重视。

本部分仍采用母亲不在本户居住的时间作为工具变量，并假设农民工家庭中的父亲对家庭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决策权。除孩子留守外，我们还控制了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个人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类型、健康状况等。同时还控制了必要的家庭特征，如家庭总收入、常住人口数、未来发展意愿、流动类型以及省份。

具体结果见表 4。首先我们来看模型 6 的结果。OLS 回归和 2SLS 回归的结果都显示，农民工家庭中，孩子留守对年度总支出有显著的负影响。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留守的系数从 -0.23 增长到 -0.39，并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孩子留守家庭的年度总支出要比孩子随迁家庭低 39%，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的各项生活成本都更高，孩子随迁至城市后各项相关花销都增加造成的，这种猜测可以通过模型 7—11 的结果得到印证。

模型 7 的结果显示，孩子留守对家庭烟酒支出具有显著的负的影响，

表4 子女留守对家庭各项支出的影响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留守	-0.231** (0.1149)	-0.390** (0.1831)	-0.336 (0.2754)	-0.868** (0.4276)	-0.632*** (0.1816)	-1.165*** (0.2905)	-0.368 (0.3783)	-0.476 (0.5667)	-0.599 (1.0153)	-1.405 (1.5787)	-0.659* (0.3831)	-0.950* (0.5588)
总收入对数	0.0198 (0.0404)	0.0153 (0.0403)	0.272*** (0.0971)	0.266*** (0.0947)	-0.1 (0.0641)	-0.0998 (0.064)	-0.0311 (0.1296)	-0.0318 (0.1272)	0.138 (0.2509)	0.165 (0.2171)	-0.204 (0.1581)	-0.193 (0.1496)
居住地 常住人口	0.208*** (0.0525)	0.187*** (0.0563)	0.168 (0.1254)	0.0897 (0.1319)	0.363*** (0.0829)	0.305*** (0.0892)	0.807*** (0.1688)	0.817*** (0.1742)	0.402 (0.4144)	-0.406 (0.3821)	0.724*** (0.1824)	0.694*** (0.1841)
父亲留在 迁入地意愿 (控制组： 不确定)												
五年及其以下	0.0218 (0.1557)	0.067 (0.1675)	0.842** (0.3827)	0.989** (0.3909)	-0.0236 (0.2622)	0.0412 (0.2575)	-0.41 (0.519)	-0.577 (0.5152)	0.691 (1.3549)	0.37 (1.1563)	-0.475 (0.5163)	-0.649 (0.5192)
永久	0.248** (0.1004)	0.252** (0.1041)	0.556** (0.2386)	0.454* (0.2428)	0.351** (0.1581)	0.386** (0.1643)	0.335 (0.3221)	0.177 (0.3218)	-0.0373 (0.746)	-0.531 (0.6722)	0.615* (0.3361)	0.547* (0.3315)
R ²	0.2061	0.1955	0.2112	0.2215	0.2955	0.2909	0.1919	0.2064	0.3631	0.4183	0.2466	0.2677
N	437	437	437	437	437	437	437	437	127	127	310	310

注1:表中控制了父母和子女年龄、受教育年限、父母劳动合同类型、是否自我雇佣、年龄、省份等变量,为了节省篇幅,结果没有报告。

注2:***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2SLS 回归的结果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家庭总收入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结果和实际情况相符,家庭收入越高,用于烟酒这种非必需品的支出越多。而孩子留守在家,父亲可能会更加节俭,出于对留守孩子的生活状况的担心,同时也为了弥补自己不能陪伴孩子的愧疚心理,父母会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节省非必要支出,汇更多的钱给家里的孩子。

模型 8 考虑了孩子留守对农民工家庭住房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孩子留守与住房支出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且 2SLS 估计的结果显著小于 OLS。这种结果表明,孩子留守会降低家庭的住房支出。这是因为农民工独自外出务工,为了省钱可以忍受较恶劣的居住环境。但在孩子随迁的情况下,一方面,在城市的同住人口增加,需要更大的居住面积,同时可能会为孩子选择更好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考虑到孩子的就学,农民工父母可能会选择距离学校较近的地区居住,而学校附近的居住成本往往高于同等居住质量的其他地方。所以孩子随迁会相应增加家庭的住房支出,孩子留守则反之。

居住地常住人口数量对总支出和住房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常住人口越多,日常开销越大,所需居住空间越大,需要更大的住房。与不确定自己在迁入地生活多久的农民工相比,想要永久留在迁入地的农民工各项支出都显著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对未来预期较好造成的,想要永久留在迁入地的农民工,预期未来收入稳定,会更愿意消费,选择更好的住所,甚至购买房屋;而那些不确定自己外出务工时间的农民工,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模型 9—11 显示了留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考虑到孩子入学年龄为 6 岁,我们以孩子年龄为分界将样本分为孩子 6 岁以下的样本和孩子 6 岁及以上的样本。根据模型 9(总样本)和模型 10(孩子 6 岁以下),留守对家庭的教育支出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控制孩子年龄为 6 岁以上时,留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负影响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孩子学龄期,农民工子女留守在家乡会显著减少家庭的教育支出。这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使孩子随迁到城市就学可能需要缴纳高额借读费,其他各项费用如书本费等与农村相比也更高;另一方面,选择令孩子随迁的农民工可能本身就更加注重对孩子的培养和陪伴,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同时受到城市教育理念的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更加重视,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更多,从而与留守家庭相比,支出更多的学业辅导费用以及艺术特长辅导费用。除此之外,农民工留在迁入地的意愿也对学龄子女的教育投资有一定影响,有永久留在迁入地意愿的家庭相比其他家庭会增加教育支出。这部分群体普遍能力强,

对自身发展的预期乐观,对孩子也有更高的教育期待。

另外,对比模型 11 的结果,模型 10 的结果不显著,即选择令孩子留守的家庭与令孩子随迁的家庭相比,教育支出并无显著差异,这反映了农民工对孩子的学前教育普遍重视不够。方建华、王玲艳(2007)通过对南京地区 3~6 岁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入园率低,且呈现出年龄越小入园率越低的特点。在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方面,农民工父母的认识还比较欠缺,同时,由于学前教育并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存在入园贵、入园难现象,给农民工父母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令农民工望而却步。

为了进一步观察迁移地点不同的子女随迁家庭与子女留守家庭的支出差异,我们将家庭迁移点分为省会城市、市区、县城,通过各类家庭支出的均值计算出各类子女随迁家庭各项支出较子女留守家庭高出的比例,以此直观地表现差异。

表 5 子女随迁家庭的各项支出较子女留守家庭高出的比例

	省会城市	市区	县城
总支出	0.0501	0.7705	-0.0628
住房支出	-0.1948	0.9751	0.0252
烟酒支出	-0.4412	0.2094	0.1909
教育支出	-0.0045	0.113	-0.3594
样本量	103	232	102

由表 5 的结果,省会城市的子女随迁家庭的烟酒支出均值比子女留守家庭低约 44%,而总支出则高出 5%,这与上文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而县城的子女随迁家庭,表现则与省会城市的家庭相反,他们的烟酒支出均值高于子女留守家庭约 19%,同时总支出低了 6%。

考虑到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生活环境,将孩子带去城市的农民工可能本身就更加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同时受到城市教育理念的影响,更愿意为教育进行投资,比如课外学习辅导和艺术辅导;另外,城市的基础教育成本也相应较高,如学费、择校费等,造成子女随迁家庭的教育支出更高。市区的结果印证了我们的猜想,但是在省会和县城,随迁家庭对教育的支出低于留守家庭。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进一步观察了不同地区子女留守、子女随迁家庭的子女年龄分布,发现在省会和县城中的子女留守家庭中,子女年龄 6 周岁以上的比例显著高于随迁家庭。而在市区,子女年龄分布无明显差别。考虑到学龄子女各项教育支出更高,可解释省会和县城子女留守家庭支出更高的现象。一般来说,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城镇居

民收入水平有一定差距,而省会城市的子女随迁家庭相较留守家庭,将面对更高的生活成本,这就使得他们减少非刚性需求,减少对烟酒这类非必需消费品的支出。县城的子女留守家庭则主要存在对留守在家儿童的顾虑问题,出于补偿心理减少非必需支出,汇更多的钱给孩子——县城的子女留守家庭教育支出比子女随迁家庭更高这一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因此,省会城市的子女随迁家庭和县城的子女留守家庭对烟酒支出水平更高。

而住房方面,省会城市子女随迁家庭的住房支出更少,这可能是由于在省会城市住房成本很高的情况下,拥有住房的家庭更倾向于使子女随迁。市区和县城的结果与上文相符,子女随迁家庭的住房支出更高,是由于子女的随迁影响了父母的住房选择以及住房条件,使支出增加。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今,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问题值得我们长期地关注。本文首次从子女留守对农民工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出发,试图探索子女留守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利用 CHIP2013 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子女留守对农民工父亲收入和家庭支出的影响,发现在克服了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的影响之后,子女留守对父亲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而子女留守对家庭的总支出、烟酒支出、住房支出以及教育支出的影响均为负向。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选择令子女留守的多为能力较低的个体;同时子女留守会减少农民工家庭各项开支,有利于农民工进行经济积累。

为了弥补农民工之间的能力差异造成的决策差别,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来缓解现存的留守儿童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弥补农民工之间的能力差异造成的决策差别入手,通过进行与子女随迁相关的文化宣传、思想教育,使城市农民工意识到留守儿童可能产生监护不力、教育不足、亲情缺失等问题,令其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陪伴。如向农民工介绍留守儿童生活的现状,介绍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分析介绍因留守导致的案件例子等方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方面的帮助来增强农民工的信心。比如通过迁入地的地方优惠政策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可能产生的各种不便,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医疗等各方面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入学贵的问题。同时政府也应更重视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规范农民工用工管理,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权益,完善农民工的工伤保障体系。

通过以上两种途径,可以弥补农民工之间的能力差异造成的决策差别,消除异地就学对农民工家庭经济积累的负面影响,增强农民工对于携子女随迁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期,降低农民工外出务工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而有助于提高农民工选择让孩子随迁的概率,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参考文献]

- 高文书, 2006:《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 洪小良, 2007:《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孔祥利、栗娟, 2013:《我国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8省区1860个样本调查数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梁宏、任焰, 2010:《流动, 还是留守? ——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刘靖, 2013:《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与消费支出研究——来自北京市的调查证据》,《江汉论坛》第7期。
- 罗凯, 2011:《子女性别偏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 钱文荣、李宝值, 2013:《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679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 宋锦、李实, 2014:《农民工子女随迁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孙泽华, 2012:《性别偏好对迁移父母经济行为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曼, 2005:《北京农民工消费与储蓄选择——基于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吴晓刚、张卓妮, 2014:《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杨舸、段成荣、王宗萍, 2011:《流动还是留守: 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选择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叶静怡、王琼, 2013:《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财经研究》第1期。
- 于洁, 2015:《进城农民工家庭教育支出决策行为分析——基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实地调查》,《教育学术月刊》第2期。
- 苑会娜, 2009:《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来自北京市农民工调查的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
- 张翼、周小刚, 2012:《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调研世界》第1期。
- Duleep, H. A. and M. C. Regets, 1996, "Admission Criteria and Immigrant Earnings Profil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0(2): 571-590.
- Erman, T., 1997, "Squatter (gecekondu) Housing Versus Apartment Housing: Turkish

- Rural-to-urban Migrant Residents' Perspectiv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21(1): 91-106.
- Ferrer, A. and W. C. Riddell, 2008, "Education, Credentials and Immigrant Earning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41(1): 186-216.
- Meng, X. and J. Zhang, 2001,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3): 485-504.
- Wilkins, R., 2003, "Immigrant Earnings Adjustment: The Impact of Age at Migration",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42(3): 292-315.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Their Father'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YANG Juan, LI Ling-xiao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apit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their father'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is problem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is paper, we got the conclusion by using IV method and the migration data of CHIP2013. According to the study,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more capable tend to make their children move with them, but the results become non-significant by consider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will have more expenditure,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and housing expenses.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and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 郑 磊 责任校对: 郑 磊 胡咏梅)